



复旦大学出版社
邱江宁 梁杰 著
《吴澄年谱长编》(全三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王涛 著
《康复时代》四部曲

□任天晓

在中国哲学体系建设中,元代并无一席之地。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上层治理与儒家文化疏离、多元文化差异并存的朝代,完成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与普及化,全国各州县大府建书院学校四万余所,天下人无不学习朱子之书。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在吴澄的推动下形成的,进而奠定了明清数百年的主流思想风貌。由此观之,吴澄对近世思想界的贡献。《吴澄年谱长编》将吴澄的人生际遇与时代变革、学术演进相弥合,勾勒出一幅草原部落进入汉地本位背景下的士人生活与思想文化长卷。

吴澄生于海迷失后元年(1249),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离世,一生见证了蒙元王朝的初建、统一、繁荣与衰落。吴澄六十岁之前拒绝出仕,两次为官经历十分短暂,第一次用三年时间实行教法改革,之后不辞而别;第二次任英宗翰林学士,泰定经筵讲官,仅半年而辞。他的大部分时间是以老师的身份居乡著书教授,然而他的影响力却颇为深远。《长编》在还原吴澄生活场景时重点关注其全国性影响力的生成过程,及事件背后的价值隐喻,显示出编者的思考深度和对宏观问题的把控。

以皇庆元年(1312)首次辞官为例,编者分列虞集、揭傒斯的观点及陈得芝、张欣等学者的研究,指出辞官的根源在于:吴澄推行的“教法四条”乃继承程颢、胡瑗、朱熹之学,注重明体达用与道德义理,与许衡以来只注重洒扫应对式的小学教法不合。这一事件继而牵扯出吴澄学术性质上的“朱陆合会”问题以及国子监中许衡后继者的顽固势力,是南方士人进入北方权力体制时的一次激烈碰撞。吴澄的志愿远非为官这么浅薄,编者特别强调了虞集对吴澄“辩传注之得失,而达群经之会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闾奥”的教育思想定位,将吴澄置于和许衡相等的地位,纠正了许衡后学僵硬教条的不良风气并继承发展了许衡涵养德行之初心。这为吴澄之后担任经筵讲官以及全国性儒师名望的确立奠定基础。

《长编》为展现吴澄日常生活及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建构了力求完备的编纂体例,包括“国家背景”“重要人物活动”“吴澄经历及撰述”“重要文化及文学著述”“重要文人生平介绍”“重要人物生年”六大板块,年谱条目共计1288条,按语1865条,引用文献469种。编者在处理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时本着由浅入深、由点带面的原则,尤其是“按语”的设置,使得该书在文献征引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研究视角和编辑意图,表现出其在年谱类

书籍体例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例如书中选取的第一则材料即是抚州临汝书院的创建,重点强调了朱陆会同的思想传统。中统五年(1264)拜书院山长程若庸为师,又指出吴澄并非全然认同饶鲁学派。元贞元年吴澄受东湖书院山长赵文讲学邀请,按语引申云:二人的相识“意味着江西抚州文学与庐陵文学的一次交锋”,显示出温柔敦厚与抒发性情的文风差异。至正四年(1344)书院重修,虞集作记,由沙刺班主持郡学,参与者多为少数民族士人。大德十一年(1307),吴澄谒见兼山学派黎立武,学派成立于程颐弟子郭忠孝,因与洛学有出入而为朱熹批判,但吴澄对之评价颇高。由此可见元代书院早已打破宋代师门派别之争,展现出思想的多元性与交融性。

体例的灵活性更能反映出编者独到的见地。一方面,《长编》对同一文本内涵多层次挖掘。比如运用互见法将一篇文章置于不同视角下,《送李扩序》分别出现于皇庆元年(1312)邓文原入国子司业、吴澄辞官南还、皇庆二年(1313)虞集发文评论、延祐元年(1314)邓文原为贯云石文集作序几处,串联起吴澄在朝堂浮沉的真实境况。至元四年(1267)吴澄作《谒赵判簿书》按语首先总结道此文主旨是对科举时文的厌弃,和对程朱道统的继承。接着引录全文,又按引明代汪舜民就此文反驳程敏政认为吴澄“合会朱陆”的史料,指出该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能表明吴澄早年以程朱后学自任的文章”,体现了编者认为吴澄以朱学为主导的学术判断。

另一方面,《长编》对不同文本探求其背后共通的价值内涵。“国家背景”中有大量内容是有礼乐祭祀的史料,这是儒家文化进入蒙元上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象征。编者对释道及异族文化素材的长篇引述亦在彰显时代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吴澄的价值抉择,如西夏文《大藏经》刊印、印度僧人指空讲法泰定帝、《十善福经白史》译本全文抄录等。吴澄曾居五峰寺作《易纂言》,撰写过数篇道观、佛院记,赞扬白莲教;亦在面对佛教葬礼盛行时坚定选择古制,拒绝为藏经作序,探讨易学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佛老。对勘而读可挖掘出丰富的文本内涵,供读者进一步反思。

综上所述,《长编》以其精准、独特、丰富的文献属性,为我们诠释了吴澄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在元代这样一个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中接续道统,担负起“学术未替”的艰巨使命,这构成了那个变革时代的重大命题,对整个中国思想界意义甚大。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

□张秀功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疾病常被赋予道德、政治与美学意义,在文学中往往被设置为多重象征体系。如,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被视为对底层人“不洁生活”的惩罚;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将“肺癆”与国民性愚昧捆绑,疾病成为社会病态的缩影。解读作家王涛的《康复时代》,就需要在文学史的卷轴上,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比照“四部曲”所折射出的时代特征,确认“疾病”这一符码的所指意义。

虽然苏珊·桑塔格在替作为隐喻的“疾病”祛魅,但作为小说叙事聚集点的“疾病”视角,绝不会只是一个叙事的能指符号,也不只是叙述“疾病”的生理或肉身痛感,关注更多的还是心理、精神上的焦虑或不安,因此,“疾病”不止于作为个体存在的镜像,而且还是一面社会批判的多棱镜。《疾病传说》中“饕餮综合征”表现出来的无尽的个人“贪欲”,《诊断报告》中“强迫症”中来自内心深处的“控制欲”,两者侧重于个体的存在;而《忧郁时刻》的“忧郁症”和《中毒反应》的“疯狂”病症则极具批判性。

小说四部曲所叙述的各种“疾病”均撕裂了人与世界的理性关系。《疾病传说》中“柳兰芽的风月”,柳兰芽与童小星是一对恋人,正常的男女恋爱当然不会排除情感上的纠葛,但因柳兰芽的个人出身,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心中不断成长的那条“饕餮之虫”,这对有情男女终成陌路之人。“石未来的旅程”中功成名就的吴苗壮始终未能释怀少年时代对余离离的爱而不得,于是,他以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诱使余离离与石未来离婚。当余离离挣脱婚姻枷锁后,吴苗壮却骤然抽身离去,最后余离离也只能在支离破碎的情感废墟中沉沦。小说的叙述虽说立足于现实,紧贴生活日常,但在故事情节安排上,小说家却有意将人物的成长史或情感过程处理得既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也违背了道德伦理,加缪将这一病态的社会现象称为“荒诞”。

小说借“疾病叙事”剖开我们生存境遇中令人震颤的“荒诞性”,《康复时代》诸多被疾病撕裂的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疾病图谱。如《诊断报告》中的李戈耀,在革命初期,她以违反革命纪律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胜利后,又因革命中所犯的过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再如,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莫博赏,他是研究强迫症的医生,在给心理病人治病的同时,发现自己也是一位“强迫症”患者,为了彻底搞清楚强迫症的病因,他似乎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对他发号施令,他决心要把那个控制他行为的“影子”抓住。费尽了各种周折,他终于把那个越来越清晰且渐渐长大的影子抓到了。影子告诉他,它是他的儿子,为了自身的长大,它不但要控制他的行为,而且要最终吃掉他的性命。莫博赏大惊失色,决定把它彻底杀掉,以阻断它对它的毁灭。于是,莫博赏使出浑身的力量,把围拢着它脖颈的两手迅速收紧。莫博赏从濒临崩溃的迷幻状态中醒来,发现把自己的命根扯断了。其他病患人物还有李百家、姜无疾、李达理等,皆可如是观。

这些试图与世界建立理性关系的人,最后都走向了非理性,这种荒诞的本质是悖谬性,也是悲剧得以生成的根本原因,所以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鲁迅小说《药》的荒诞性就建

立在“人血馒头”既是治病的药,又是杀人的刀的悖论上。这种悲剧性的荒诞,不仅体现在个体命运的断裂中,还反映在社会整体的失序与混乱里。如《忧郁时刻》,李蒙克的纵火案被嫁成周岫娟的“自首”,张效梁的死亡被改写为自杀殉情,美国律师的遗产馈赠成为植物人父亲的伦理黑洞。这种“真相的不存在”恰好印证了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言:“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与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每个角色都在编织自洽的生存逻辑,但这些逻辑最终都在他者叙事中分崩离析。派出所对纵火犯的两次“无罪释放”,警察以制造谣言为名将李蒙克送入精神病院,市长用电视演讲消解洪水预警,这些场景构成福柯式“规训社会”的加缪变体。

如果将荒诞世界的“疾病”这一集体症候进行切片化验,那么悖论性是其最主要的病理结论。由此可以看到,“饕餮综合征”“强迫症”是个体的病痛,而“忧郁症”除了个体“中毒”之外,更多的是其病症的社会“毒性”。面对荒诞的人生和社会,海德格尔提出要在“沉沦”的生活实现中知觉到“畏”,摆脱“非本真”的人生,进而达到“本真”状态。如托马斯·曼的《魔山》,疾病成为汉斯超越平庸的动力,在“向死而生”的生命体验中直面存在的荒诞性,疗养院对汉斯来说不但是“魔山”,还是炼狱;加缪同样在他的小说《鼠疫》中把奥兰城居民抛入一种集体流放的状态,人类在荒诞世界中被剥夺了意义归属,面对鼠疫,里厄医生选择以“诚实的无知”投入抗争,医生“承认荒诞的存在,但拒绝屈服于荒诞”。

与萨特的以文学“介入”社会的理论不同,针对世界的荒诞,加缪选择了“反抗”,即对无意义世界的抗争。作家在《康复时代》中,暴露“病痛”之后,便是“疗救”。李蒙克一直在追踪妻子,几次探访乌龙镇,这种不断“迷失”之后的不断“寻找”,使他在每次接近真相后,都会陷入更大的荒诞结局,但却具有了西西弗斯反复推石上山,不屈于命运折磨的抗争意味;莫医生四次回到乌龙镇,表面上是对不同人物死亡原因的调查,实际却是他逐渐认识“强迫症”的过程,对“强迫症”了解得越清晰,他对荒诞的反抗就越强烈,他遭到“疾病”的反噬也就越严重,所以,当他处在加缪所言“觉醒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却进入了反抗即是对荒诞献祭的困境。“四部曲”对世界“荒诞性”的反抗停留在两个层次上,莫医生、李蒙克,包括李二女,都是经由物理肉身“死亡”的反抗;李线长虽说与之不同,他的抗争也只是在宗教或哲学的“死亡”层面上。加缪认为,反抗不在个人而在集体,在《鼠疫》中他没有坠入对“荒诞”的绝望渲染中,而是通过反抗者的群像(里厄、塔鲁、格朗等)传递出一种“悲观的英雄主义”。即便荒诞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加缪说:真正的胜利在于记住苦难,记住抗争,记住在黑暗中彼此紧握的手。

反抗就要有所行动,里厄来往于奥兰城病患者之间,李四平为消灭“毒蘑菇”几乎扎根莫邪山中,凭着坚强的毅力实现了对家庭荒诞命运的抗争。小说《康复时代》四部曲的“疗救”指向十分鲜明,作家借由“疾病叙事”构建“荒诞”乌龙镇这个文学疆域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把“手术刀”递到读者手中,先去解剖自我,然后再剖析社会,力图在“病痛”之后开出一张“疗救”人性的诊断书。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文化读本】

《吴澄年谱长编》：元代思想文化长卷